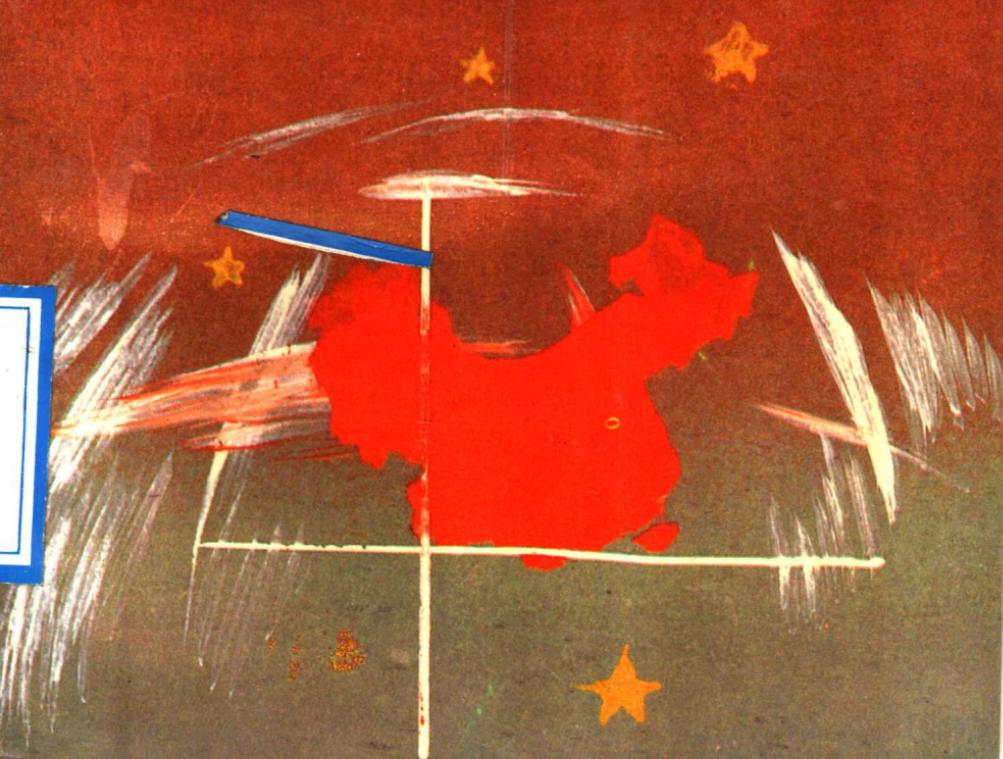




江蘇人民出版社

中國： 在地球坐標系上

夏軍著



中國： 在地球坐標系上

夏軍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中国：在地球坐标系上（世纪之交丛书）

编著者 夏军

责任编辑 陈中南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地址：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县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4.625 插页 2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97 千字

版 次 199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878—5/C·44

定 价 2.05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簡介

夏 軍 上海市人，
1944年9月生於江蘇
省盱眙縣，畢業於復
旦大學哲學系，1982
年獲哲學碩士學位，
現為上海市委黨校副
教授，近年來著有關於
哲學、哲學史、現代西方哲學、文化、
政治等方面的專著、
論文多部（篇）。

《世紀之交》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 編：夏 軍

副主編：程林勝

編 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 楠 米壽江 余孟仁

周安伯 夏 軍 張桂嶽

程林勝 程極明 劉勇堅

Db. 32

序

夏军

20世纪即将过去，它背负着历史的重荷，以及对新世纪的企盼行进；新的世纪正带着几分热望和几分焦虑凝视着我们。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是一段关键的较量、抉择和转换时期。这一时期，从生存环境、经济态势、政治格局，到生活方式、文化心理，都处于一种艰难、痛苦的矛盾遑遽状态。这种状态的形成、展开以及新状态产生的渐进过程，孕育着一种历史发展的巨变。因此，与其届时蓦然回首，不如即时深沉反思。在关系到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纵横交错的立交桥上，需要冷峻、明睿的眼光，同时又是敏锐、迅速的反应。

当今，世界局势之动荡，人类心理之困惑，机遇和希望之涌现，前所未有。然而，已经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中华民族，必将以其特有的果敢和聪慧，驱散障眼的迷雾，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从十个方面，对世纪之交的状况作了简要阐述，旨在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提出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作者力求做到兼顾科学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而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一孔之见、一得之功。但如能使读者得一启迪，并使我们得到指点，则实为幸甚。

1991.4

引　　言

世界的变化太快，现实与历史几乎同步，使人来不及停下来思索，搁笔四顾，发觉星移斗转，笔下所云，已为陈迹。许多事的发生，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而另有一些事，虽在意料之中，却不知来得如此迅猛。本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重大事件的频发程度，超出战后任何时期。这些事件，将整个地球引入急速旋转的涡流之中。在今天的世界里，不论你是否有意“走向世界”，世界大潮也会冲上门来，将你卷走。可以预计，从现在到下一世纪初，将没有一年是平静的。在这瞬息万变、动荡不安之际，首先要做的事，莫过于审时度势，辨清自己所处的位置。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形势。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但其中涌动着种种不安因素。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硝烟不断，冲突动乱此起彼伏，强权政治时露狰狞。在欧洲、北美大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断扩大南北差距，形成对第三世界的全球性掠夺态势；美国、西欧、日本之间的较量，映现出早期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的投影。在西方大国与第三世界之间，在美国、西欧、日本之间存在着的日益深刻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带来频繁的磨擦和尖锐的对立。人人皆云的“国际新秩序”，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词汇，而这一新秩序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争取稳定共处的不稳定过程。

20世纪初至二次大战后，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群，

这个群体在战后持续了40余年。而在近两年，东欧的一批国家和苏联政局发生剧烈动荡，社会主义正遭受严重挫折，进入弯道和低潮。西方大国头面人物难以掩饰其兴奋地预示“到下一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称90年代是为“开创美国新世纪”而打好基础的年代，“我们现在正在接近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目标之间的一场历史性较量的尾声”，其踌躇满志，溢于言表。此刻，人们正密切地关注着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并十分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中国。不论西方某些人如何渲染他们的“战绩”，人们毕竟清楚地意识到以下不容否认的现实：

历史并没有到此终结。

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所走的道路，对世界格局及人类命运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尽管沧海横流，形势严峻，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依靠自己去探索、实践和创造的历史性机会。虽无现成模式，却不乏前车之鉴。本世纪最后10年至下一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实现民族腾飞的关键时刻，现实不容许有任何犹豫和彷徨，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巩固国防，实现全民族的安定、团结与统一，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磅礴的精神气势，回答世界资本主义的挑战。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处境与选择	(1)
一、身临90年代国际格局的转换	(1)
1、1991年欧洲七国首脑会议	(1)
2、国际格局的转换	(5)
3、中国在多极关系中	(11)
二、直面两种制度的生死较量	(20)
1、举目西望	(20)
2、疾风才知劲草	(26)
三、处在民族腾飞的关键时刻	(32)
1、“球籍”与“世界公民”	(32)
2、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	(34)
3、力克“顽症”，免入“误区”	(39)
4、要发展，必须善待自然	(43)
5、还是吃饭问题最大	(46)
6、门敞户开，生意盎然	(49)
第二章 强国之路	(56)
四、关键在于科技竞争	(56)
1、还是要靠“赛”先生	(56)
2、中国科技现状	(59)
3、“863”计划	(62)
4、管理也是科学	(65)

5、归根结底是人才问题	(68)
五、“民强”则“国富”	(71)
1、盛衰成败，在此一举	(71)
2、关于我国教育的再思考	(77)
3、需要健康的形象	(81)
六、法治乃久安之本	(86)
1、法治——国体的保障	(86)
2、以法维护民族团结	(91)
3、实现祖国统一之梦	(93)
4、人心思定是趋势	(95)
七、不可或缺的后盾	(101)
1、世界及中国周边军事态势	(101)
2、党必须指挥枪	(104)
3、“不战而屈人之兵”	(107)
第三章 中国精神	(112)
八、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	(112)
1、视角与位置	(112)
2、世界意识与民族意识	(116)
3、一个民族要有点精神	(121)
4、何以生生不息	(128)
九、中国意味着什么	(134)
后记	(138)

第一章 处境与选择

一、身临90年代国际格局的转换

1、1991年欧洲七国首脑会议

1991年，多事之秋。

始于1990年8月的海湾危机，以1991年3月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告结束。硝烟加油烟，带来了气候异常、灾变频发，也使国际政治扑朔迷离，风云突变。在海湾战争后赚足“腰包”的布什，读书不多、却颇有学者风度的梅杰，满脸堆笑的海部等西方“富国俱乐部”的头面人物，成为世界的弄潮儿。尽管布什的面容有时显得疲惫，并带有几分焦虑，其实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而做。1991年他确实很忙。这一时期来，苏联国内政局变化、东欧多米诺骨牌效应、阿以冲突、南非的种族纠葛、南斯拉夫内乱……世界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与动荡，客观上造成多向选择的可能性，即所谓“机遇”，这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不论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有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大政方针和发展道路的问题。然而，对于受制于国家基本利益、经济状况及其文化价值系统的首脑人物来说，这种机遇只体现为一种在基本方向确定前提下的随机性。作为已成唯一超级大国领袖的布什，尽管取得了采取比以往更为灵活的方针

的机会，但在根本上却依然承袭了美国历届总统的“美利坚精神”和所有行之有效的手段，不遗余力地去实现制约、操纵其他国家和地区，左右世界局势的梦想。海湾战争后，强权政治抬头，美国、欧共体、日本指指点点，甚是风光。他们以儒雅的微笑取代以往的形象，俨然一副族长、富豪兼调解委员会主任的架势。在他们看来，不管什么事——是我家的事还是你家的事，是外交还是内政，我都要插嘴，不仅插嘴，还要插手；你现在不听也可以，我自有办法迫使你最终还是要听我的，于是，经济的、文化的、武力的、和平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当然，更多的还是挥舞以钢鞭为茎、匕首为瓣的“橄榄枝”。一个时期以来，在对待苏联、东欧、中东等许多国际事务上，美国和欧共体以“经济合作”、“援助”为名，进行控制和干预，这似乎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1975年以来，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倡议，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以及1976年加入的加拿大，曾多次举行七国首脑会议。开始几年，这种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协调经济政策，后来，它的政治色彩日见浓厚。1991年7月15日至17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伦敦举行。英国首相梅杰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会议的宗旨是加强国际秩序，建立世界伙伴关系。因此，会议讨论的内容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围，除了通过《经济宣言》外，还通过了《政治宣言》、关于常规武器转让和不扩散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军备控制宣言》及会议公报。引人注目的是，七国首脑会晤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七”对“一”的方式，讨论苏联所提出的与西方“经济合作”的要求，协调对苏政策。

7月17日下午，西方七国首脑与戈尔巴乔夫见面。面对

七国首脑，戈尔巴乔夫努力控制自己，使自己的表情、姿态保持一种适当形象，给西方一个良好印象，从而使他们慷慨解囊。据报道，戈氏一再声称他不是到伦敦乞讨，但据苏联官员说，他确实希望伦敦之行能带回“数十亿美元”。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戈氏在会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再那么兴奋和激动，难以掩盖他对一揽子计划缺少实质内容而感到的失望和沮丧。

早在会议之前，苏联迫于面临的危机，就已经频频向西方呼吁援助。所谓“哈佛计划”，即由苏联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和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亚夫林斯基参与制定的方案。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系成员国资格，卢布将成为可兑换货币，并进一步扩大私有化、非国有化，放开价格，保证经济和“民主”取得稳步发展，这样就可以从西方得到每年200亿至350亿美元的援助。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计划。在伦敦会议前，戈尔巴乔夫给七国领导人写了一封长达23页的信，介绍苏联改革计划，“希望得到恰当的理解”，要求西方“拆除障碍”，“采取行动”。

西方七国首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明确表示：“我们一如既往，大力支持苏联出现的根本改革的进程”，“支持他们为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政体以及一个市场经济所作的努力。”其中，德、法、意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他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在调整对外战略、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体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答应给予苏联以较大数额的援助，以稳定欧洲的局面。而美国、英国、日本则不热情。布什曾说，要援助可以，但苏联的“改革”必

须有一个详尽的计划，即使如此，“批准援助也是困难的，我们并非有的是钱。”日本则说，不解决北方四岛问题，不给钱。西方的基本态度很明确，要求戈氏大幅度减少军事开支和对古巴的经济援助，完全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的“民主”政体和“真正的改革”。塔斯社的评论说，苏联和国外的许多分析家都把苏联经济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意图，看成是“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向资本主义过渡”，认为这种看法“显得过于简单化了”。

这次欧洲七国首脑会议，像一面镜子，比较集中地映现了90年代国际局势的显著特征。西方大国的颐指气使，苏联的窘迫处境和被动地位，说明了世界格局的显著变化。一些主张坚持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十分自然地考虑：国际间的援助是必要的，但是，苏联得到的那些西方大国的援助究竟能解决多少问题？为争取到这些援助，苏联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际间的援助问题，而是涉及到两种制度的一场尖锐的斗争。1991年8月以后苏联的逐步解体，便是最好的佐证。

在走向新世纪的进程中，一个被称为“东方巨人”的国家，将世界上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沉稳地观察着、思考着，并不轻易说话，对别国的事从不指手划脚，这就是中国。对于中国，同情支持者有，说三道四者也有。但人们都了解她的性格，知道她存在的分量和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当今中国，无需躁动于世，仅仅她沉重的呼吸，对于某些患有“妄想”、“多动”症状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有效的警示。他们明白，很难将中国与那些已经倒在西方怀抱中的国家作简单的比较，用“援助”或制裁等手段对中国是难以奏效的，中国不

是那么容易归顺于西方卵翼之下的。中国不会出卖主权、出卖原则去向西方换得援助。这次欧洲七国首脑会议说明，一旦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受制于人，屈服于压力和诱惑，这个国家的衰败便指日可待了。

2、国际格局的转换

国际格局，是当前政治家及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题目，它无非说明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均衡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态势，通常习惯用“极”或“元”、“角”、“边”等来说明。所谓“极”，是从世界范围而言的。一般说来，要成为一极，必须有强大的国力，包括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还要看在国际事务当中是否具备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极，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制度、某种意识形态，或在某个区域中形成的国家集团。战后，德、意、日同盟国战败，英、法大国地位受到重创。1945年在苏、美、英三国雅尔塔会议之后，形成了以苏、美两个大国为核心的国家集团的对峙，即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由于与苏、美不同的亲疏关系而存在的分野。今天，这两种格局已经打破。尤其是苏联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及其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转折的今天，苏联这一极迅速衰落。大多数人认为，现在的国际格局已经从两极转为多极，其中有三极说（美、德、日或美、苏、中），也有五极说（美、苏、西欧、中、日）。其基本含义是，战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主宰世界的局面不复存在，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

界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的过渡时期。

这种格局的转换，反映了当代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大变化。首先，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60年代以来，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1950年至1970年，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5%，日本则为10%。1973年与1950年相比，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8.1倍，法国增长11.7倍，西德、意大利增长9倍以上，美国、英国为4.5倍与6.2倍。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节，垄断进一步深化，国家所有及国家与私人共有的垄断企业在全部企业中的比重提高。战后，私人垄断公司每年将50%左右的企业利润上缴给国家，私人垄断公司的所有权实质上为与国家共有。国际资本不仅在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中实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间联盟不仅成为各西方国家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促成西方各国之间协调发展，如区域性大市场、货币、税制上的一体化趋向，对于缓解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加强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控制，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后，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展高科技，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人与新领域规划”等，都将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作为一个战略性的计划，以实现技术—经济的革命性变革，并藉以达到更大程度上控制世界经济、扩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的目的。美国还耗费巨资大力发展空间技术，通过外层空间的技术进步达到地面称霸的目的，按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有这样，美国在21世纪才不至于成为“二等国家”。与此同时，高技术的运用，扩